

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体系调整与中国因应

李奇前

摘要：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调整动向、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值得跟踪与关注。基于特朗普 2.0 时代的政策话语、军事互动与经贸政策三个方面，可以明确其动向包括重申对亚太盟友承诺并强化责任的对等分担，以高强度军演、前沿部署及先进能力协同等重塑威慑结构，以“对等关税”计划等实现经贸安全化，叠加议题联盟与跨区域联动等内容。上述动向展现其特征为交易式联盟常态化、小多边主义与层级化、网络化倾向，以及价值叙事与交易逻辑并存。上述联盟体系的演进将推高军备竞赛与危机联动风险，压缩中小国家战略空间，并冲击区域与全球治理规则。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主动分化对手联盟，塑造良好的周边合作基础，并着力保障中小国家利益。

关键词：特朗普 2.0；亚太联盟体系；大国竞争；国际安全；地区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6）03—0062—10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均将其界定为“交易型”总统，将这一执政风格与其长期在商界浮沉的经历挂钩。在其第二任期，这一执政方式再次延续，同时也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个人化”“强制性”与“大交易”特征。^① 联盟体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维度，大西洋联盟体系、亚太联盟体系、美洲联盟体系以及“非北约重要盟友”构成美国联盟战略的支柱。^② 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体系聚焦于高级政治和传统安全维度，近年来虽呈现议题扩散的趋势，但具有地缘政治属性的军事联盟始终是其存在的底色和基础。这一属性势必与特朗普“交易型”的互动模式产生张力。据此，在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有何动向、呈现何种特征以及有何影响亟须讨论。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亚太联盟体系的矛头直指中国，对其进行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的战略定位，掌握战略主动；其二，亚太联盟体系的调整必然对中国的周边地区局势产生复杂性影响，带来复合型挑战，“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③，周边地区的重要地位要求对这一动向予以关注。

一、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的新动向

从话语、实践和联盟拓展三个维度来看，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体系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主要遵循的原则是灵活现实主义，坚持责任共担的“去成本”逻辑。

作者简介：李奇前，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大国博弈、国际安全研究。

① 赵明昊、仇家畅：《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当代美国评论》2025 年第 3 期。

② 魏冰、刘丰：《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扩张的逻辑》，《拉丁美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③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0 月 24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_ao_674904/1179_674909/202310/t20231024_11167069.shtml，2025 年 12 月 11 日。

（一）战略规划与政策话语的更新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亚太联盟体系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地位界定，主要体现在国防部部长等相关官员的讲话、特朗普亚洲行的相关表态以及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但是，上述政策话语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特朗普与其他官僚的表态之间存在张力，既有内部分歧之表现，也有“黑脸白脸”之嫌。

第一，亚太联盟体系重要地位的再确认。早在2025年1月14日，拟提名美国国防部长的赫格塞斯强调，美国需要通过“印太”盟友加强军事合作等措施构建区域军事联盟网络以维护地区安全秩序。^①2025年2月，特朗普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时表示，美国将以实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②同样在2月，赫格塞斯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宣称美国需要增强对华威慑并突出“印太”地区及相关盟友的重要性。^③2025年5月，赫格塞斯再次表示，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承诺不应受到怀疑，坚定、有实力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是美国的关键战略优势。^④总之，亚太地区盟友的地位整体上得到了再次确认。

第二，基于对等盟友关系的战略认知。亚太盟友是对华威慑的前沿，但基于交易原则，对等盟友关系认知日渐明显。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赫格塞斯要求“印太”地区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其GDP的5%，次月，美国国防部将这一标准正式应用于所有盟友。^⑤特朗普也曾公开表达不满，认为美国负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指责日本没有承担保护美国的责任。^⑥上述表态展示了美国对对等盟友关系的关注，有学者将其作为美国评判盟友好坏的标准，认为盟国国防开支高于其GDP的5%且美国对其保持贸易顺差则可被视为“好盟友”。^⑦

第三，给予盟友的经济价值以更多关注。在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虽然美国明确表示“印太”盟友的重要性，但这更倾向于关注经济领域。与2017年和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不同，新版报告更多关注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中美经济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对美国经济独立性带来的“威胁”，这赋予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盟友更多责任。既包括提供基本的经济力量协同美国对“掠夺性”经济行为进行遏制，也涉及确保盟友经济不受竞争势力的影响或形成从属关系。^⑧据此，报告认为需要将联盟体系整合为经济集团（Ibid），凸显了亚太盟友的工具性特征。

（二）安全互动与威慑结构的再塑造

在安全互动中，特朗普2.0时代的主要实践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军事演习和前沿力量部署提升地区威慑能力和军事影响力。美国与亚太盟友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演训活动。2025年，美菲举行“金色眼镜蛇—2025”联合军演，并在网络空间作战等新兴领域进行了探索。^⑨美韩、美菲分别举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之盾”联合演习和“肩并肩—2025”联合军演；美澳主导举行“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系列规模之大同样创造历史；美日举行了“坚毅之龙”联合军演。此外，美国首次在菲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

①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2025). Opening Statement, Secretary of Defense Nomination Hearing. Retrieved on 11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hegseth_opening_statement.pdf.

② 项昊宇、杜兰：《收缩与聚焦：美国“印太战略”的嬗变与前瞻》，《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5期。

③ Pete Hegseth (2025).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As Delivered). U.S. Department of War. Retrieved on 11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064113/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ukraine-defense-contact/>.

④ Pete Hegseth (2025).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U.S. Department of War. Retrieved on 11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

⑤ 孟晓旭：《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3期。

⑥ 项昊宇、杜兰：《收缩与聚焦：美国“印太战略”的嬗变与前瞻》。

⑦ Victor Cha and Andy Lim (2025). Trump's Prism: No Ally Is Good Enough. CSIS. Retrieved on 11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s-prism-no-ally-good-enough>.

⑧ The White House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trieved on 11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⑨ 陈菲、张靖：《结构性失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东南亚政策》，《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6期。

弹以增强前沿威慑能力^①，还计划升级澳大利亚廷达尔空军基地并部署 B-52 战略轰炸机，并对澳出售价值超 10 亿美元的空对空导弹^②。

第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讨价还价互动。特朗普交易型联盟塑造思维，将安全承诺与盟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贡献程度直接关联，坚持“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盟友直接承担安全成本，强调美国没有责任为联盟承担“无意义的义务”。^③美国要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提高其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其中日本和韩国提升至 5%，澳大利亚提升至 3.5%。^④若盟友难以达成美国提出的安全费用分担要求，则面临被抛弃的风险。这种将安全盟友关系商品化的交易方式，塑造了以胁迫手段换取盟友付费的利益维护路径，以提升美国自身的独立性和利益对等性。

第三，在先进能力等领域实现合作再拓展。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发等途径提升盟友军事能力是美国“印太战略”三大支柱之一。^⑤AUKUS 是美国先进能力的代表。2025 年 12 月 10 日，美、英、澳三国国防部长举行的 AUKUS 部长会议重申了三方对 AUKUS 的共同承诺。^⑥国防工业合作的代表是“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PIPIR）机制。基于此，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建立 P-8 反潜巡逻机雷达维修基地，为美国盟友提供装备保障。^⑦此外，美国还将新型舰艇的维护、修理等服务作为美韩造船业合作的重点^⑧，并同印度达成“面向 21 世纪的美印协定”，加深两国在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合作。

（三）联盟扩展过程中的广义“安全化”与跨区域联动

联盟体系的拓展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经贸领域走向泛安全化。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着力打击经贸及金融领域的“非互惠”行为。这种泛安全化实践不乏对盟友的关注与攻击。美国曾威胁对日本和韩国加征 25% 的“对等关税”，经过谈判，这一关税水平降至 15%，而对东南亚盟友及伙伴国家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关税，例如，越南为 20%，泰国和菲律宾为 19%。^⑨这种涉及盟友的泛安全化实践，既是对特朗普政府“美国至上”理念的践行，也是对以经济保障安全认知的呈现。

第二，传统盟友角色的议题化调整。特朗普再次当选以来，传统盟友及伙伴的议题化角色相较于拜登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2025 年 2 月，美国同印度联合实施“美印战略技术转型计划”（TRUST），旨在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⑩此外，美国还联合日、韩等盟友持续打压中国芯片产业。^⑪美国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基础，着力拓展联盟的适用性，建立推动“四方港口未来伙伴关系”“四方关键矿产倡议”“四方海底电缆联结和韧性伙伴关系”等议题领域的协同。^⑫据此，

① Courthouse News Service (2025). 'Shared Adversity' as Philippines, US Launch Joint Military Drills. Retrieved on 12th Dec. 2025 from: <https://courthousenews.com/shared-adversity-as-philippines-us-launch-joint-military-drills/>.

② 项昊宇、杜兰：《收缩与聚焦：美国“印太战略”的嬗变与前瞻》。

③ 周明、周文婧：《“美国至上”：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联盟策略重构与中国应对》，《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 年第 4 期。

④ 项昊宇、杜兰：《收缩与聚焦：美国“印太战略”的嬗变与前瞻》。

⑤ 另外两个支柱分别为优化前沿军事部署和通过“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Pete Pete Hegseth (2025).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As Delivered).

⑥ Matthew Olay (2025). Hegseth Hosts AUKUS Meeting With Australia, U.K. Counterparts. *U.S. Department of War*. Retrieved on 12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ar.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356519/hegseth-hosts-aukus-meeting-with-australia-uk-counterparts/>.

⑦ 赵明昊、仇家畅：《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

⑧ 刘阿明：《特朗普 2.0 “印太战略”的新动向》，《当代世界》2025 年第 7 期。

⑨ 陈菲、张婧：《结构性失衡：特朗第二任期的东南亚政策》。

⑩ Rudra Chaudhuri(2025). What is the India-United States TRUST Initiative?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trieved on 12th Dec. 2025 from: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5/04/what-is-the-india-united-states-trust-initiative?lang=en>.

⑪ 周明、周文婧：《“美国至上”：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联盟策略重构与中国应对》。

⑫ The White House (2025).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Washington. Retrieved on 12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5/07/joint-statement-from-the-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in-washington/>.

美国与盟国和伙伴拓展合作关系的趋势日益明显。

第三,推动联盟体系多元联动。其一,亚太地区既有联盟的“1+X”式拓展。例如,“美日+”小多边联动,包括“美日+菲”三边联络官制度和“美日+澳+菲”在情报、监视及侦察领域的协同。^①美国还积极推动南太平洋地区盟友间的合作,如美、澳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强三边防务合作。^②其二,与域外联盟的联动。2025年日本曾向法国等国表示增强彼此协同,加强防卫与防务合作,日本与欧洲也在亚太“北约化”与北约“亚太化”的基础上强化国防工业联动。^③此外,2025年2月10日,美日法三国开展“2025太平洋斯特勒”联合军演,增强跨区域联动。

二、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的特征

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体系并非简单收缩或退出,而是呈现以交易逻辑为牵引、以小多边网络为组织形态、以广义安全议程为扩展抓手、以价值叙事张力为内在矛盾的复合型特征。

(一)“交易式联盟”常态化与成本—安全议价

第一,联盟关系呈现合同属性。美国延续量化盟友贡献、对安全承诺“标价”的路径。同盟义务不再被视为抽象的共同安全责任,而被转换为可核算的财政分担、驻军成本与军贸收益,安全承诺成为谈判筹码。美国以加强前沿部署作为可见供给,以盟友提高军费、扩大军购、承担基地升级与运维成本等作为对价,将亚太联盟关系塑造为持续滚动的“成本—安全”议价过程,而非稳定的制度性承诺。该过程对盟友形成双重约束,即既要在国防费用投入上“达标”,也要在经贸与产业等层面给予美国与安全保证对等的经济回报。^④这一机制在强化盟友对美国安全供给依赖的同时,也把盟友锁入对美经贸与技术体系的路径依赖。

第二,“交易式联盟”常态化加剧联盟困境。在“牵连—抛弃”理论中,盟友既担心被主导国“牵连”卷入高风险对抗,也担心因自身贡献不足而遭“抛弃”。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式路径强化了联盟困境。一方面,前沿威慑与高强度演训更易触发危机升级,使盟友对“牵连风险”更敏感;另一方面,美方以关税、市场准入等手段施压盟友,又使“抛弃”风险在心理层面常态化。^⑤换言之,美国以更强烈的付费要求与更具不确定性的承诺表达,迫使盟友用更高的成本来“购买”确定性;而盟友为避免被抛弃而增加投入,导致被牵连风险增加。据此,盟友在提升贡献以换取确定性与降低卷入以保留回旋空间之间反复摆动。

第三,亚太盟友通过讨价还价争取“有限自主”以面对压力。一是通过提高军费与强化前沿协同以换取安全的确定性,同时在非核心议题上保留可操作空间;二是在对美合作的同时维持与其他大国的经济联系,以“对冲”行为降低单一依赖风险。例如,2025年12月12日,中韩两国商务部门负责人时隔多年再次会面,商定“为推动贸易规模增长和扩大相互投资加强合作”。^⑥三是部分国家通过多边平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约束,形成不以军事对抗为主的软制衡。因此,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并未削弱,而是促使盟友把自主性更多落实为技术、供应链与产业层面的弹性安排。

(二)小多边主义与层级化网络结构日渐加强

第一,塑造“同盟+伙伴+机制”的多圈层结构。相较于轴辐式体系,特朗普 2.0 时代联盟体系的显著特征是多圈层结构。这实则是在双边同盟为骨架,叠加了小多边机制、议题联盟与跨区域协作。例如,

① 孟晓旭:《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日安全政策评析》。

② 刘丹:《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进南太军事战略的路径及其局限》,《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6期。

③ 葛建华:《美日欧联动发展国防工业的路径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6期。

④ Pete Hegseth (2025).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⑤ 李泽:《安全相互依赖视角下美国亚太联盟的小多边化》,《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5期。

⑥ 边龙珠:《韩中经贸部门首长在京会晤商讨合作事宜》,韩联社,2025年12月12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51212003100881>, 2026年12月20日。

特朗普在亚洲行中既关注了美日、美韩等双边关系,也关注 AUKUS 等小多边机制以及“美日+”等多边协同。^①这使美国得以在不大幅增加自身投入的情况下,高效推动盟友之间分工协作、能力互补与行动衔接。^②这种多圈层结构提升了联合威慑的可用性,降低了美国单独承担地区安全成本的压力。

第二,亚太联盟体系呈现清晰的层级化特征。日、韩、澳等核心盟友承担安全协同与先进能力对接的责任;菲律宾等次级核心盟友承担前沿支点、通道控制等责任;印度、越南等关键伙伴被嵌入到关键矿产、技术标准等议题合作中,形成围绕安全、经济、规则的复合参与模式。与排他性同盟不同,层级化是以不同的义务强度、敏感度与收益结构对各国进行重新功能定位。有学者指出,大国往往在地区秩序中塑造某种等级化安排,以便在差异化承诺中实现可控的秩序管理,由此带来同一国家在联盟网络内参与深度与议题敏感度显著不同的情况。^③

第三,小多边机制成为“去责任化”的主要选择。小多边机制核心功能之一是风险外包,即通过把情报、监视侦察、海上执法、基地保障、军工产能等任务分散给盟友与伙伴,美国得以在资源约束下维持长期存在与持续威慑。这为美国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政策选择空间。当成本过高或国内政治压力上升时,美国可通过降低参与层级或由盟友主导等方式保持影响而不必承担全部政治后果。此外,基于小多边机制,美国得以对地区热点摩擦实施常态化管理,使危机处置从临时动员转向例行化协同,提高联盟网络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三) 安全议题的广泛性与议题联盟重要性

第一,安全议题覆盖范围扩大并呈泛化趋势。特朗普政府不但延续并强化了海空优势、前沿威慑、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对抗等传统安全议题的优先地位,还把人工智能等新型安全议题嵌入联盟协作议程,甚至非安全议题被日益安全化。^④具体而言,通过高强度、多频次的联合军演不断提升威慑的“可见度”,赋予先进能力合作与工业韧性机制更强的战略内涵,既强调联盟的军事作用,也强调其保障性功能。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动 PIPIR 机制性合作,以提升“印太”地区盟友在后勤维修和供应链韧性等方面的能力。^⑤传统与新型安全的叠加,推动联盟从防御性共同体向能力—产业共同体演化。

第二,议题联盟重要性提升。在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在非安全议题中构建排他性阵营成为新的联盟协作路径。这与地缘经济的逻辑类似,即在地缘竞争中综合运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据此,盟友不仅是军事上的协作者,也是规则的协同塑造者和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其经济结构、监管制度以及产业政策均被纳入安全的评价框架。这将使得同盟更具整体性,但也易导致经贸议题政治化和安全化。议题联盟的实质是把同盟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对经济和技术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安排的协同塑造与共同排他。

第三,议题联盟韧性增强展示其重要性。非传统安全议题被频繁地纳入“韧性”和“可靠伙伴”的叙事体系,以此增强同盟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例如,前文提及的“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等合作倡议,本质上是以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为载体的制度联结,这既降低了 QUAD 的军事敏感性,又使其能在关键议题领域发挥战略作用并增强联盟网络的韧性。^⑥通过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同盟得以在无战争的情况下保持运转,且能够在危急时刻快速切换为军事安全协同模式,从而做好平时与战时转换的组织准备。

① 楼春豪、王宽:《美国强化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曹筱阳:《从拜登到特朗普2.0:美日菲小三边机制的战略动向与前景》,《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② Matthew Olay(2025). Hegseth Hosts AUKUS Meeting With Australia, U.K. Counterparts.

③ Evelyn Goh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3, 113-157.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⑤ 赵明昊、仇家畅:《应对竞争性多极世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初探》。

⑥ The White House (2025).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Washington.

（四）价值观与身份叙事的矛盾性

特朗普 2.0 时代依然强调价值与身份叙事，其正以工具化的方式被嵌入到战略竞争之中。维持现状—修正主义等二元叙事常被用于划定阵营边界和确认伙伴资格，并为议题联盟提供所谓合法性来源。特别是在技术博弈和国际规则塑造等领域，价值叙事常被用于增强对外一致性和提升国内动员能力。例如，在 2025 年《国际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继续强调“自由、主权、国家独立与制度安全”，同时把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非互惠”行为与国家安全风险进行联结，以此为联盟动员提供政治正当性与社会性基础。^①

特朗普 2.0 延续“文明危机”和“西方衰落”等修辞，这种政治修辞更强调危机感、竞争感与自救式动员，导致其盟友被要求承担更多和更加明确的责任，同时盟友需要以更高的国防开支与使美国受益的经贸安排来证明其可靠性。当盟友无法满足美方期待时，美国则倾向以“不对等”“搭便车”等话语来解释与盟友关系的摩擦互动，由此为加压与再谈判提供叙事依据。^②这种政治修辞强化了同盟的纪律性，但削弱了盟友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淡化了盟友对彼此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预期。

不可否认，价值观共同体话语与现实主义交易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一方面，同盟以共同价值作为联结纽带，另一方面，美国却在关税、市场准入与产业政策等维度对盟友施加压力，甚至把盟友一致性地纳入“对等关税”与经贸安全化的框架。^③当盟友在经贸领域感受到实质性成本时，其对价值叙事的接受度会下降，转而更重视风险分散与政策弹性。由此，同盟作为身份认同的定位被削弱，功能共同体与交易共同体的色彩显著上升，这也将成为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所具有的最突出的内在张力。

三、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演变的影响

特朗普 2.0 时代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化、层次化、议题化与交易化，将在地区安全格局、国家战略空间与区域秩序层面产生外溢影响，其短期影响或许会强化威慑与提升对抗烈度，中期影响会压缩中小国家政策回旋余地，长期来看则可能重塑区域治理结构并加剧制度竞争。

（一）对地区安全格局与地缘政治局势带来挑战

第一，加剧军备竞赛并影响威慑稳定。关注核潜艇合作与导弹防御体系等前沿能力与部署的联盟协作将极大改变危机阈值。AUKUS 被确认继续推进意味着相关能力建设进入交付阶段。此外，“堤丰”的前沿部署实践，也会使周边国家更倾向通过对称或非对称能力来恢复威慑平衡。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前沿威慑与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容易触发地区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一方的防御性行为会被另一方视为进攻性准备，从而推动军备能力竞逐并提高危机敏感度。在联盟政治中，“被牵连—被抛弃”焦虑与对对手意图的不确定叠加，会进一步放大误判概率。在此背景下，地区“安全困境”更易走向“自我实现”，威慑稳定的维护成本将显著上升。

第二，前沿威慑与联盟网络加剧危机跨域联动风险。特朗普再任以来，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路径将国际社会重新带回权力政治时代，高强度演训与前沿威慑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手段。这种高烈度的博弈和军事化行为，会提升冲突可能性，而热点地区的联动属性导致一处摩擦可能被盟友解读为整体挑战，从而触发跨域增援与态势升级。例如，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会牵涉美韩军演与延伸威慑议题；南海摩擦会导致相关盟友增强海上存在与执法协作，强化所谓“航行自由”认知与宣传。当联盟网络化程度提升、行动衔接更紧密时，局部事件可能触发跨域联动，进而导致误判与意外升级。

第三，前沿军事活动的增加将加剧大国博弈。联合演训是前沿军事活动的典型表现，其更强调实战化与联合化，相关行动所展示的威慑信号强度在显著上升。多国联合演训的规模增大与频次增加，会使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② Pete Hegseth.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③ The White House (2025).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greement. Retrieved on 12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9/implementing-the-united-states-japan-agreement/>.

博弈各方依赖通过近距离接触来测试决心与能力,由此增加冲突风险。在“灰色地带”层面,执法摩擦、海空抵近与电子对抗等非战争类军事行动的阈值可能被进一步压低,这对风险管控提出更高要求。“灰色地带”冲突的特点可被归结为低烈度、高频次;低可归责、高政治性。此类互动会在实践中侵蚀互信并使对抗叙事固化。上述前沿军事活动的增加将加剧美国同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将在事实上增加外部战略压力。

(二) 对地区国家战略空间的压缩与再塑造

第一,推动地区内的中小国家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小国家普遍依赖多边机制来降低选边成本并获取政策回旋空间。例如,域内东盟国家维持其外交政策灵活性的核心策略是通过多边平台参与地区事务,同时避免对外部行为体形成过度依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化”联盟策略使得地区国家的外交选择再次陷入困境。特朗普要求地区盟友在安全事务上提升自身责任,并在经贸问题上强化“对等原则”,这一政策取向加大了相关国家在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平衡难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通过塑造议题联盟,尝试在不直接引发强烈政治对立的情况下,改变地区合作的制度重心。这将冲击东盟、RCEP等多边合作框架的中心性和有效性,也将迫使其重新思考如何凭借机制合作在多边主义与地区安全的互动上找到新的角色定位。

第二,加剧核心盟友在“同盟义务—战略自主”之间的选择困境。在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框架下,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重要盟国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战略成本。这种成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军事开支与能力建设要求的提升,特朗普政府明确要求这些盟国在军事上做出更大贡献,以应对相关国家的挑战;(2)前沿部署和基地协作的深化,这要求盟国在战略部署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参与;(3)产业链供应链的嵌入,美国在经济与产业合作中强化了对盟国的依赖,尤其是在高科技、军事技术和能源等领域。在上述压力下,盟友不得不面临在同盟义务和战略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问题,既要通过增加军事和战略贡献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需要避免过度刺激周边安全环境来维持战略平衡,增加互动难度。

第三,催生关键伙伴的“选择性结盟”与议题分化对冲。对于印度等关键伙伴而言,其会深度参与对其有利议题而在敏感议题上保持相当距离和灵活性。例如,美印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领域进行深度互动,体现了两国在技术和产业上的协同与合作,而在传统军事同盟领域,印度依然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①印度通过与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但并未放弃与俄、法等国家的军事合作,避免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选择性结盟”使盟友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在不同的议题上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展开合作。这可能带来议题分化的问题,即多元的议题合作可能导致协调成本上升且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共识,挑战区域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 对区域秩序与全球治理产生外溢效应

第一,加剧“印太”秩序与传统亚太秩序的竞争。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依旧强化了对亚太地区联盟体系的依赖,并利用这一体系来塑造区域秩序。在该框架下,“印太”叙事更强调安全合作和军事协同,导致域内国家需要在大国博弈进程中进行阵营选择。亚太叙事侧重以包容性机制促进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在经济和安全议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渐被安全化,导致地区国家在进行区域合作框架选择时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在经贸互动的“对等原则”被制度化之后,某些国家可能会因亚太合作机制的吸引力下降而倾向于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这一趋势将导致地区国家的战略偏好转向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合作模式,甚至彻底抛弃包容性和发展导向的合作模式。

第二,联盟体系扩展冲击既有区域性治理架构。在特朗普 2.0 时代联盟网络扩展的背景下,小多边和

^① The White House (2025). United States-India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Retrieved on 20th Dec. 2025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united-states-india-joint-leaders-statement/>.

议题联盟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制度平台,其具有更高的决策效率和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联盟网络的扩张也对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等传统的区域治理机制构成挑战。上述传统机制强调包容性和共识构建,致力于为所有成员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共同发展的平台。在特朗普政府塑造的联盟体系的影响下,区域治理开始有赖于圈层化机制提供的公共产品,导致地区治理机制逐渐丧失中立性与普惠性。联盟体系的强化会导致治理制度的碎片化和规则竞争的生成,由此进一步压缩治理空间并塑造多元并行的规则体系。

第三,议题联盟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重塑效应。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的议题联盟化策略将带来全球治理由普遍规则转向圈层规则。据此,投资审查等政策工具逐渐被制度化并通过联盟网络向外扩散。例如,美印在半导体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协同既是经济合作,也关涉如何共同制定技术标准、管理敏感技术出口等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的走向和技术标准的塑造。议题联盟化的影响同样存在于全球安全与经济的深度耦合之中。在泛安全化和泛地缘政治化的背景下,国家日益重视安全底线并将经济议题安全化,这将极大抑制全球化的运行效率,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协调性并加剧治理赤字。

四、特朗普 2.0 亚太联盟体系演进的中国因应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美国战略界愈发将中国的角色塑造为竞争对手,2017 年和 2022 年的《国际安全战略》直接将这一战略定位官方化。还有学者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以表明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宿命。^① 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体系是对这一战略认知的直接回应,中国需要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妥善应对。

(一) 避免陷入大国对抗

避免出现战略定位不清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国际战略取向的核心定位,是中国外交的底色。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以阵营化和泛安全化的形式构筑亚太联盟体系,遏制、打压和威慑的色彩浓厚。中国需要明确自身战略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守住战略底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不受美国意图的过度影响。

避免陷入被动回应逻辑。特朗普 2.0 时代的联盟调整具有显著的议题扩散与泛安全化特征,其核心目标在于塑造对华战略压力。国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会将对手的防御性行为误判为进攻性意图导致“安全困境”。^③ 中国在战略回应中需要审慎处理,避免采取直接的对抗性路径。该路径既会增加大国冲突的风险,也会导致中国在战略上陷入被动,甚至为美国联盟网络的构建提供合法性。中国应坚持竞争不对抗的基本原则,以差异化的回应路径降低被直接卷入高强度对抗的风险。

避免博弈失控走向全面冲突对抗。如前所述,当前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呈现出前沿接触增多、风险阈值降低、跨域联动增强的趋势,带来局部摩擦演变为系统性冲突的风险。机制具有平台性作用,有助于降低误判并延缓冲突升级。^④ 据此,中国需要强化危机管控机制,在海空相遇规则、军事热线机制及危机沟通渠道等方面持续推进制度化建设,以减少“灰色地带”摩擦失控的风险。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战略还强调泛安全化的议题政策,中国需要推动在技术、经贸等领域的“去安全化”实践,通过议题分离的策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维持合作空间,避免竞争升级和冲突全面扩散。

(二) 主动分化对手联盟

需要把握美国亚太盟友的不满与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将安全承诺与费用分担直接挂钩,通过“对

① 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③ Robert Jervis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④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0—106 页。

等关税”等手段对盟友施压,降低了安全承诺的确定性,导致客观上削弱了联盟的稳定性。中国可从三个维度分化美国联盟:一是构建经济共同体,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关系黏性;二是通过“楔子战略”给予美国盟友以安全压力,考验“交易主义”原则下美国的安全承诺;三是以制度对接的方式开展对外联系,更好地契合各国历史、文化特色。

需要推动实施议题分化策略。在技术、产业链与规则制定等领域,美国试图构建排他性议题联盟,需要承认,不同国家在利益诉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部分亚太国家存在供应链和市场领域靠中国,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的“双重依赖”结构。特别是小国对大国的力量变迁十分敏感,它们通常选择适应而非制衡崛起国。^①中国可以在关键议题上实现选择性嵌入,一定程度上削弱联盟的排他性和整体性。

需要对关键伙伴采取差异化政策。中等强国更倾向于通过对冲来维持战略空间,而非完全倒向某一阵营。^②印度、越南等国家对战略自主高度重视,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更多体现为选择性参与。中国可通过推进机制性合作与互动,增加同相关国家在非安全领域的合作黏性并降低冲突预期,由此削弱其在安全议题上向美国靠拢的动力。

需要利用价值叙事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张力。特朗普 2.0 时代的联盟体系在话语上强调价值共同体,但在实践中存在现实张力,一定程度削弱了联盟的规范基础。中国需要坚持强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等理念,在叙事层面争取联盟外部圈层国家的认同。与此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合作等政策实践进行理念规范的国际扩散,推动博弈由价值观维度转向规范和制度维度。

(三) 稳固周边合作基础

以制度性合作提升区域合作预期。美国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不断侵蚀传统多边框架的中心性,对此,中国需要强化以东盟为核心的制度网络。一方面,深化 RCEP 规则,在原产地规则、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等领域形成更高水平制度整合;另一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建设,坚持规则升级与制度创新。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提供合作预期,制度合作的关键在于使区域国家在经济与制度层面对中国形成稳定的合作预期,降低其在安全压力下进行政策转向的可能性。

以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地区合作吸引力。公共产品供给是大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重要来源,其能够在非对抗性路径中塑造地区秩序。^③特朗普 2.0 时代联盟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将产业链安全化,导致地区国家以美国作为最终市场的发展路径受阻,未来发展预期不足。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提供制度性与物质性公共产品,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增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统筹双边与多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特朗普 2.0 时代的联盟体系强调安全优先的“印太”秩序,中国应在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共同愿景的指引下坚持发展导向,通过经贸合作与产业链联通增强与地区国家的发展安全联结,使其在战略选择中更倾向于稳定与合作。通过强化区域价值链与供应链合作,有助于在结构上削弱安全对抗逻辑的吸引力。通过多元化的机制联结和多维度的网络合作,塑造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制度基础,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四) 保障中小国家利益

缓解中小国家选边压力。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阵营化特征,中国应坚持开放与包容的原则,通过开放区域主义的路径提供非排他性的制度形态。例如,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中强调的非约束性合作原则和在 RCEP 框架下推动渐进式规则整合,这可以使中小国家在不承担安全成本的前提下参与区域合作,有助于降低其选边成本,淡化其进行阵营化、对抗性合作的意愿,缓解选边压力。

尊重并支持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中小国家致力于在大国之间维持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中国需要通过灵活安排与差异化合作支持其自主性。例如,在安全议题上保持克制,在经济合作中提供更多可

① 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

② Evelyn Goh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③ 曹德军:《差序性权威与新兴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6 期。

供选择的空间。同时，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中，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话语权与议程设置空间，发挥其施动性。这既有助于增强合作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也可以弱化联盟体系的排他性。

助力中小国家发展繁荣。中国可以通过共建利益共同体助力实现共同繁荣。区别于美国以安全为核心的联盟体系，中国可以通过经贸、发展与社会合作建设多维度利益纽带，推动中小国家在结构上与中国形成深度关联。还需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以利益共同体塑造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摒弃建立对抗性安全共同体的合作模式。利益共同体凭借其关注实际收益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得性。但是，在推进合作时，中国需要增强项目透明度、优化融资结构并强化风险评估，防范“债务陷阱”等负面叙事，提升合作质量。

总而言之，中国的因应之策，始终立足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以发展合作破解“安全困境”，以开放包容实践对冲排他性联盟，这不仅是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甚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守好合作底线，才能让亚太地区远离对抗冲突，实现建设“五大家园”的共同愿景。

Adjustment of the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 in the Trump 2.0 Era and China's Response

LI Qi-q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The adjust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associated impact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warrant close tracking and attention.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rump 2.0 era, policy discourse, military interaction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the key trend can be identified as reaffirming commitments to Asia-Pacific allies couple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equal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ie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principle of equitable burden-sharing; reshaping deterrence structures through high-intensity military exercises, forward deployments, and coordination of advanced capabilities; advanc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reciprocal tariff” plans; and reinforcing issue-based alliances alongside cross-regional linkages. These developments exhibit several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nsactional alliances, the expansion of minilateralism accompanied by hierarchical and networked tendenci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value-based narratives with transactional logic. The evolution of this alliance system is likely to intensify arms races and the risks of crisis linkage, compress the strategic spa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and disrupt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norms.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strategic composure, proactively differentiate rival alliances, foster a favorable foundation for neighboring cooperation, and focus o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Keywords: Trump 2.0, the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onal Order

[责任编辑：陈慧妮、赵蔚平]